

优化类型定位背景下高职新型教材开发的实践样态与框架优化

唐正玲 程越

摘要 新型教材建设是现阶段撬动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实现优质资源共享、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当前高职院校的新型教材开发实践初见成效,但在概念认知力、开发能力、开发规范性、改革可持续性等方面存在问题。职业教育的类型属性是新型教材开发的逻辑起点,开发高质量的新型教材是现阶段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应有之义。类型属性下的高职新型教材开发应注重模式应用的适切性,内容选择的职业性、实践性、先进性与思想性,内容组织的重构逻辑、工作逻辑与整合逻辑,以及呈现方式的纸数融合化。基于实然性问题样态与应然性基本遵循,可从健全工作机制、改进技术路径、细化管理策略等维度探索优化高职新型教材开发的实践框架。

关键词 类型定位;活页式教材;工作手册式教材;实践样态;实践框架

中图分类号 G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4)23-0036-06

作者简介

唐正玲(1989-),女,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助理研究员中,研究方向: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宁波,315012);程越(1978-),男,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副教授,研究方向:职业教育管理

基金项目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浙江省中华职业教育社2023年科研课题“‘职教助共富’视域下高职院校县域服务评价及优化路径研究”(ZJCV2023D03),主持人:唐正玲;全国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国家一般课题“基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我国职教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BJA210104),主持人:张宇;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2023年度教学改革重点项目“类型教育视域下高职院校新型教材建设研究与改革”(jg202307),主持人:唐正玲

一、问题提出

教材是课程教学内容的重要载体,是人才培养不可或缺的支撑与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活页式、工作手册式等新型教材建设是现阶段撬动职教领域课程与教学改革、实现优质资源共享、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党的十九大以来反映职教改革发展重大举措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职教二十条”)、《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发展意见》)、2022年修订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

称新《职教法》)等政策文件中均指出,要加强教材建设与创新,倡导使用活页式、工作手册式等新型教材;强化教材建设国家事权,完善教材建设与管理机制。

“职教二十条”明确提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2021年全国职教大会后“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更加成为业内共识,类型地位发展由政策认定阶段逐步转向内涵探索阶段^[1];新《职教法》赋予了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法律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2022年《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等都强调,要持续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进一步强调了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作为一种教育类型,职业教育的教材开发必然有

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2019年教育部《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规定,教材编写要突出职教特色;2021年《“十四五”职业教育规划教材建设实施方案》指出,规划教材要突显职教类型特色。因而职业教育的类型属性应是职业教育新型教材开发的逻辑起点。同时,开发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新型教材也是现阶段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新的教材模式催生了新的研究范畴,特别是近三年高职领域有关活页式、工作手册式等新型教材的文献数量呈明显增长态势。研究主要是对新型教材概念内涵、特点等的思辨性阐释,也涵盖对新型教材开发原则、思路、路径等的探索性构想。然而对于高职院校新型教材开发实践相对深入的研究还较少,以致许多结论缺乏足够的现实依据,这给我们留下了探究空间。例如,通过了近几年实践,高职新型教材开发的实际样态如何?是否体现了职业教育的类型属性或特色?应然层面需要构建怎样的改革实践框架?在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现阶段,以新型教材建设为抓手,深化高职课程、教学与管理综合改革,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这些问题有必要进一步明晰。这对高职教育更好地适应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增强社会服务能力,推动现代职业教育实现类型化、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二、高职新型教材开发的问题样态

随着职业教育“三教”改革、“双高计划”、提质培优行动等综合发展举措以及教材建设与管理专项发展新政的推进,高职院校不断加强与规范教材建设与管理,教材规模持续扩大、体系不断健全,教材形式与内容逐步丰富与优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职业院校启动建设了新形态教材,努力推进教材模式改革与创新。统计与汇总2023年度涉及全国32个省域、1425所高职院校的《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以下简称《质量年报》)中教材建设相关数据得出,2022年各院校编写的教材总数为46227本,其中国家级规划教材为5176本,校企合作编写教材为17763本,新形态教材为12096本,接入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材为1307本,具体如表1所示。

然而,高职新型教材建设一直处于探索阶段,其中亟待关注与解决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为了从“质”的层面了解基本样态,以浙江省为调研范围,通过对高职院校分管教学工作各级领导、教学管理人员、专业负责人、一线教师和各级

表1 2022年各省高职院校教材编写情况(单位:本)

序号	省域名称	编写教材数	国家规划教材数	校企合作编写教材数	新形态教材数	接入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数
1	安徽省	1787	297	464	254	6
2	北京市	491	53	117	133	0
3	福建省	1209	128	303	294	50
4	甘肃省	301	33	66	111	8
5	广东省	4131	580	1294	903	166
6	广西壮族自治区	1295	116	533	274	16
7	贵州省	858	63	248	303	9
8	海南省	329	14	47	109	2
9	河北省	2489	251	747	555	48
10	河南省	2838	188	725	1144	74
11	黑龙江省	812	128	333	217	3
12	湖北省	2796	284	879	704	20
13	湖南省	3623	141	1233	932	133
14	吉林省	382	53	119	106	6
15	江苏省	5187	912	2948	1530	222
16	江西省	1273	150	530	296	50
17	辽宁省	1583	192	486	324	28
18	内蒙古自治区	1070	104	362	139	15
19	宁夏回族自治区	143	13	69	44	0
20	青海省	50	9	23	16	2
21	山东省	3674	306	2155	1315	173
22	山西省	832	157	178	113	37
23	陕西省	42	7	20	15	8
24	上海市	904	84	233	80	2
25	四川省	1808	190	705	550	27
26	天津市	743	43	235	208	5
27	西藏自治区	5	0	0	0	0
28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0	0	0	0	0
2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359	28	172	112	0
30	云南省	553	81	138	102	8
31	浙江省	3359	451	1940	923	133
32	重庆市	1301	120	461	290	56
合计		46227	5176	17763	12096	1307

资料来源:统计汇总32个省份2023年度《质量年报》附表“教学资源表”教材建设数据得出。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人员、行业企业人员等多主体、多视角的深度访谈资料以及教材建设相关实践资料的质性分析,来揭示新型教材开发的主要问题样态。

(一) 新型教材概念认知力有待强化

自“职教二十条”发布以来,新型教材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但是现实观念层面,仍有许多高职教育工作者对新型教材的概念缺乏深入了解。对新型教材概念的模糊认知与理解偏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高职院校建设新型教材的积极性、能动性与实效性。从表1可以得出,2022年各职业院校开发的新形态教材数仅占教材编写总数的26%,且在不同省份、不同院校之间存在较明显差异。事实上,活页式、工作手册式等不同模式的新形态教材,各有其独特的概念内涵,应从不同角度进一步强化概念认知与理解。

(二) 新型教材开发能力亟待提升

职业教育新型教材开发是一项理论性与技术性均较强的复杂系统工程。然而实践层面,许多高职院校的新型教材主要由主编教师独自编写完成,教材开发力量不足,团队合作发挥不够,开发工作机制不健全。具体表现为:高职院校的支持与引导不到位;编写人员的能力参差不齐;出版或发行单位的水平不一。更为突出的问题是,行业企业社会的深度参与不够,新型教材开发的校企二元性体现不足。从表1可以得出,2022年校企合作开发的教材数占教材编写总数的38%,但其中很大一部分还不是新型教材。虽然有的新型教材开发团队中有了行业企业管理者、技术专家等的加入,但实际上他们的参与动力和积极性普遍不高,在教材开发中所发挥的实质性作用有限。由于教材开发过程中缺少行业与企业的深度参与、指导以及其他力量的支持,教材的最新案例素材、数字化资源等的获取或开发难度便相对较大,也很难将真实的工作情境、职业标准以及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等产业元素融入到新型教材中。

(三) 新型教材开发规范性有待提高

职业教育教材模式改革的本质不是教材物理形态的变革,而是其背后课程模式的革新。在实践层面,不少高职院校的新型教材建设只注重对教材自身特别是对教材外在形态进行变革,并未真正与高职课程建设与改革工作紧密结合。例如,有的将传统教材进行简单地重新拆分与装订便形成了活页式教材;有的将企业的实训讲义或手册直接就归为工作手册式教材。虽然一些教材的封面上标注了“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新形态式”等字样,但许多在内容设计与组织模式上与传统教材没有本质区别,彰显不出职业教育教材开发的规律与特色。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缺少对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教材模式的关注与研究,甚至有的还未真正摆脱普通教育的教材理念与模式。高职院校的新型教材开发实践还需从技术层面进一步规范。

(四) 新型教材改革可持续性尚待增强

当前职教领域诸多改革实践在紧跟政策推进的同时,也存在个别“一时跟风”的现象。在现阶段倡导使用新型教材的形势下,众多高职院校都在积极开展新型教材建设与改革。然而一些改革成果并没有真正适宜地应用于后续的课程教学实践,或者有的“束之高阁”直接回归传统的教材模式。诸如此类的教材改革实践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其积极作用便不能在院校内涵发展、人才培养中得到有效延续。因此,对高职院校自身而言,有必要配套有力的教学管理措施。然而现实实践层面,许多院校在新型教材建设管理工作中缺乏清晰的思路,存在较明显的“重立项轻规

划”“重结果轻过程”“重量化轻质量”等方面的问题。这也是当前高职新型教材模式改革不够有力的重要原因之一,长远意义上不利于高职教育教材改革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推进。高职院校有必要进一步增强新型教材建设教学管理的科学性与系统性。

总之,当前高职院校新型教材开发实践虽初见成效,但开发水平参差不齐,教材质量从整体上仍需提升。许多新型教材也未能充分体现职业教育的类型特色,未能充分契合高职深化课程与教学改革的新理念、新方法,未能充分满足高职课程与教学多样化、灵活性的新需求。

三、类型属性起点下高职新型教材开发的基本遵循

(一) 新型教材模式应用的适切性

活页式教材主要是指以活页的形式来组织教材的内容,并能灵活地进行模块组合的教材;工作手册式教材是指教材要包含如同手册中那般可用于指导操作实践的内容^[2]。新型活页式教材、工作手册式教材在现阶段优化职业院校的教材范式、提升教材质量、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增强人才培养适应性、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优势不言而喻。然而,这并不是说高职院校的所有教材都需要变革成新型教材。一般而言,活页式教材、工作手册式教材更适用于学习内容与产业链岗位紧密对接的课程,如专业核心课、专业拓展课、专业实践课等理实一体化课程或实践性较强的课程。课程学习的理论性较强、知识内容较稳定的公共通识类课程,以及专业领域中以基本原理、基本结构、基本设计等的认知或专业通用能力的习得为主要学习目标的专业基础类课程,通常没有必要也较难采用活页式或工作手册式教材。

(二) 新型教材内容选择的职业性、实践性、先进性与思想性

教材的开本、排版、装订形式等物理形态是教材建设与改革的重要方面,但最本质的是教材内容的选择。职业教育是与职业世界最贴近、与产业关联最密切、与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天然联系的一种教育类型,其最突出的特征是职业性和实践性。这就明确了职业教育新型教材所服务的课程内容应来源于真实的职业世界或工作领域,在内容选择上应确保职业性和实践性。也就是说,职业知识是新型教材内容选择的基本依据,贴近实践是新型教材内容选择的重要原则。此外,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和技术革新不断提速并持续深入,职业世界中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等不断出现。

为了保持人才培养的社会适应性,新型教材开发应密切关注工作领域中工作知识或技术知识的新变化,适时地对教材内容进行调整与更新,确保教材内容的先进性。最后,不论如何变迁,教材都承载着职业教育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是实施课程思政的载体之一。因而新型教材的内容选择应注重有机地融入政治认同、思想理论、国家意识、文化自信、理想信念、职业精神等思政元素,充分体现思想性。

(三) 新型教材内容组织的重构逻辑、工作逻辑与整合逻辑

教材建设与改革最本质的是教材内容的组织。高职院校教材变革实践需要在选择合适教材内容的基础上,对教材内容的组织逻辑进行反思与重构。新型活页式教材不是单纯外在装订形式的改变,而在于灵活地更新与优化组合教材的内容,使得高职教材开发能够紧密对接职业世界,满足可持续发展职业能力培养的需要;工作手册式教材也不是简单地指企业培训讲义或工作手册,而在于吸纳手册的实用指导功能、制定方式、内容元素等来完善高职教材的内容结构^[3],以深化产教融合教育教学改革,满足综合职业能力培养的需要。不论是活页式教材还是工作手册式教材的内容组织过程,都应最大限度地与工作过程对接,以工作领域为基本场域,以工作逻辑为基本遵循展开。此外,作为一种教育类型,职业教育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产业需求与教育需求整合的社会价值^[4]。因而高职新型教材开发在按照工作逻辑组织内容的同时,还应在符合教育教学规律、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等基础上,进行教育教学化转换,体现出教材内在组织的整合逻辑。

(四) 新型教材呈现方式的纸数融合化

为适应“互联网+职业教育”的发展需求与趋势,职业教育教材的呈现方式也应更加多样、不断升级。“职教二十条”指出“倡导使用新型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并配套开发信息化资源”;《行动计划》提出“推行科学严谨、深入浅出、图文并茂、形式多样的活页式、工作手册式、融媒体教材”。此外,各省也“鼓励开发新型活页式、工作手册式的融媒体教材及配套的数字化资源”。以纸质媒体为基础、纸质媒体与数字媒体相融合的内容呈现与使用方式已成为新型教材的重要特征与发展趋势。这种传统纸媒与数字效应互补的教材呈现方式,丰富了教材的内容量,拓展了教材的学习空间,使得教材的知识传播更加生动与高效,对推动职业教育教材的数字化转型也具有重要意义。当然,高职院校在新型教材开发过程中要注重结合教材的具体定位与内容特点,平衡好“纸”与“数”的关系,做好以纸书内容为主、

数字化资源为辅的纸数融合形式的教材设计。

四、类型优化目标下高职新型教材开发的实践框架

《管理办法》指出,职业院校要在国家和地方关于教材管理的政策框架与规定下做好教材管理工作;当国家、省级规划教材无法满足需求时,院校可结合自身实际补充建设自身专业特色的教材。高职教育具有更明显的地域性与行业性特色^[5],统一规划与管理下的教材不足以满足教育教学的需要,因而高职院校可自主组织开发具有专业特色的优质新型教材。针对高职新型教材开发存在的问题,结合基本遵循应有之义,可从开发工作机制、技术路径、管理策略等维度,探索完善新型教材开发的过程与实效,形成与凸显职业教育类型特色、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推进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相适应的高质量新型教材开发实践框架,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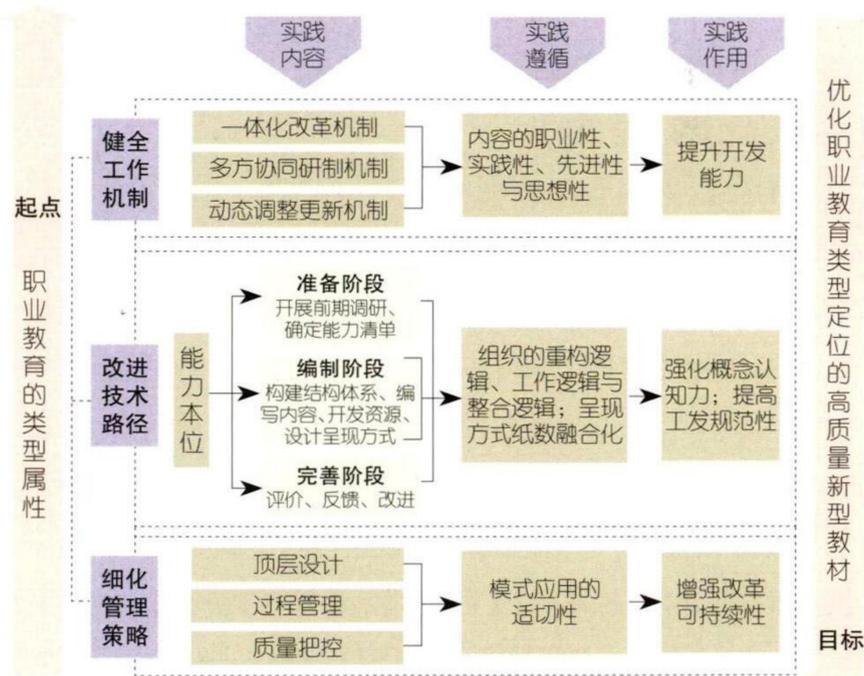


图1 高职院校新型教材开发的实践优化框架

(一) 健全新型教材开发工作机制

1. “专业—课程—教材”的一体化改革机制

在职业教育教材建设这一问题上,绝不能孤立地“就教材论教材”,而应与专业建设、课程建设统筹起来考量。也就是说,职业教育教材改革实践应与专业持续改进、课程与教学改革同步进行。高职院校新型教材模式的改革要想取得实效,前提是要建立起“专业—课程—教材”的一体化改革机制。以职业标准、专业教学标准、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等为依据,紧密结合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课程体系、课程定位、课程内容等来研究与设计教材体系、教材内容、教材资源等,从而系统地编制教材。

2. 多方协同的教材研制机制

高职院校新型教材开发实践的当务之急是改变由学校教师“单打独斗”编写教材的局面,进一步整合教材开发力量,形成教材开发合力,提升教材开发整体能力。作为一种教育类型,职业教育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于企业和学校跨界合作的办学格局。因而新型教材开发首先要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这是增强教材内容职业性和实践性的必要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倡导发挥行业指导的作用来完善职业教育教材开发机制^[6]。参照近年来国家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的开发经验,新型教材开发也可以以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为重要依托,来组织与协调行业、企业专家等重要力量。另外,由于职教领域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的研究与实践目前尚不成熟,教材内容设计、数字资源开发等的复杂程度较传统教材大得多,因而教材开发仅有校企双元的参与还远远不够。高职新型教材开发工作需要建立健全由教育行政部门、高职院校、行业组织、企业、教科研机构、出版单位等多领域的行政管理人员、院校名师、一线教师、行业企业管理专家与技术技能人才、职业教育课程专家、教材研究人员、数字技术人员、出版人员等共同参与的教材研制机制。

3. 动态调整的教材更新机制

“职教二十条”和《行动计划》《发展意见》《管理办法》等文件中均明确指出,除国家统编的教材外,其他教材特别是职教专业教材,要随产业升级情况和信息技术发展趋势及时更新。因此,高职院校新型教材开发工作要形成常态化动态调整的教材内容更新机制。对此,可由相关教育行政部门组织与指导高职院校、行业企业、出版单位、教科研机构等定期开展相关研讨与交流,及时了解行业产业发展的最新动态,对新型教材的内容进行修订与更新,保证教材内容与经济社会发展不脱节。

(二) 改进新型教材开发技术路径

教材开发与课程开发紧密联系、不可割裂;职业教育新型教材开发应关注并参照科学的职业教育课程开发范式。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以职业能力培养为导向,是能力本位课程的教材模式。因而,高职新型教材开发应坚持能力本位的课程理念,循着能力本位课程开发的技术路径,以彰显职业教育教材开发的类型特色与规律,强化教材模式的改革力度。

能力本位新型教材开发过程可划分为准备阶段、编制阶段与完善阶段。其一,准备阶段,主要包括开展前期调研、确定职业能力清单等关键技术环节。前期调研首先包括

对相关行业、企业用工需求与岗位群工作内容、工作过程等的调研,初步分析工作领域、典型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其次,调研与融入国家相关职业标准、专业教学标准、顶岗实习标准等,并结合高职教育规律、教学逻辑以及学习者认知层次、学习特点等进行教学化处理,从而形成包含知识、技能、规范、精神等要素在内的综合职业能力清单^[7];同时也要以此为依据调整与优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再者,国内外现有的高职同类教材、企业相关工作手册或实训讲义等情况也是前期调研的重要内容。其二,编制阶段,主要涉及构建结构体系、编写内容、开发资源、设计呈现方式等关键技术环节。活页式教材结构体系的构建应以能力清单为依据,对不同职业能力进行排列组合,形成各自完整、相对独立又可灵活组合的教材模块;工作手册式教材可按活页式的教材模块搭建框架,也可不进行模块化处理与组合,但也应以能力清单为基础,强化对技术技能操作流程、方法、质量标准等综合能力训练的单元体系设计。内容编写是教材开发的核心环节,也是能力培养的落脚点。新型教材的内容设计与撰写应紧密结合课程标准中的课程设计思路、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学设计要求、教材编写要求等内容。教材资源的开发也要紧扣课程标准中的教材编写要求、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建议等规定;注重对企业实际案例、操作手册、技术参考书、数字化学习素材或资源等内容进行教育教学化转换,并有机地融入教材。纸数融合新型教材呈现方式的设计要注意教学的适用性;数字资源在组织结构、链接形式、承载内容等方面应与学习任务相适应,尽可能地发挥能力培养的服务功能,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其三,完善阶段,即教材的评价、反馈与改进环节。也就是说,初步完成了新型教材的编写后,要进行审读、评价与试用,根据来自专家团队、学习者、任课教师、行业企业专业人员等多元主体的反馈信息不断地修订与完善。

(三) 细化新型教材开发管理策略

科学的教学管理模式是整体推进职业院校教材建设与改革的重要保障,也是现代职业教育教材体系的重要特征^[8]。高职院校组织自编具有专业特色的优质新型教材,这对学校的教学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基于高职新型教材建设管理工作的现实样态,有必要进一步细化管理策略,提升管理综合水平,从而持续推进教材改革创新。其一,做好顶层设计。根据国家和地方管理政策,高职院校的教材管理组织架构逐步改善,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在学校党委总负责与领导下的分级管理模式;然而在新教材开发规划与引导方面的作用发挥还远远不够。高

职业院校各级教材管理机构要结合专业人才培养和教育教学的现实需求,进一步完善新型教材建设规划。具体而言,排摸并明确当前缺乏哪些教材、哪些教材需要自主立项开发、哪些教材适合且有必要做成活页式或工作手册式等新型教材。同时对新型教材开发的基本理念与要求、新型教材编写人员的基本资质与团队结构等进行原则性规定,更要加强对新型教材概念内涵的解读以及技术流程、技术方法等开发规范方面的培训与指导。其二,加强过程管理。当前高职院校新型教材建设管理工作中,对教材开发的过程性监督与指导还未落实到位。为推进新型教材开发的进度、提升成效,确保教材开发质量,教材管理机构要加强对新型教材开

发内容、规范等的阶段性检查和持续性跟踪引导,及时地总结成果、发现面临的困境以及一些不规范的教材开发行为,从而提供适宜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或者采取相应的整改措施。其三,把好质量控制关。高职院校教材管理机构应进一步强化对自编新型教材出版前与出版后的质量把控。教材出版前,组织相关专家团队或专业机构对教材内容的思想性、职业性、实践性以及呈现方式的纸数融合程度等进行论证把关,做好教材的审读、试用等组织协调工作;教材出版与使用后,也要督促做好教材的定期修订工作,确保教材内容的先进性。

参考文献

- [1]吕玉曼,徐国庆.从强化到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属性确立的实践路径[J].现代教育管理,2022(2):111-118.
- [2]徐国庆.“活页式、手册式教材”概念辨析与应用开发[J].当代职业教育,2022(2):4-9.
- [3]李政.职业教育新形态教材:内涵、特征与编写策略[J].职教论坛,2020(4):21-26.
- [4]姜大源.跨界、整合和重构: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三大特征—学习《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体会[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7):9-12.
- [5]臧志军.边缘性与组织化:高职院校教材建设的基本立场与管理策略[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0(8):20-24.
- [6]乞佳,谷峪.继承与超越:我国职业教育教材制度建设的经验与取径[J].教育科学,2020(2):90-96.
- [7]梁建超,王仁田,林清辉.职业能力培育视域下职业教育新形态教材的开发与应用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2(26):60-64.
- [8]范竹君,徐国庆.在规制与市场之间:职业院校教材管理体系的构建[J].职教论坛,2020(4):27-32.

Practice Status and Optimization Framework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eaching Material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ptimizing the Type Positioning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ang Zhengling, Cheng Yue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eaching materials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leverag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reform, realizing the sharing of high-quality resource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t this stage.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eaching material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as achieved initial results, but it still needs to be overall improved in terms of conceptual cognition, development ability, development standardization and reform sustainability. The type attribut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eaching materials.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quality new teaching materials is also the proper meaning of optimizing the type positioning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t present stag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eaching material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ype attribute should focus on the suitability of model application, the professionalism, practicality, advancement and ideological nature of contents selection, the reconstruction logic, work logic and integration logic of content organization, and the paper-digital fusion of presentation method. Based on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and the rules should be basically followed,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and optimize the practical framewor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eaching material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the dimensions of improving the working mechanism, improving the technical paths, and refining the management strategies.

Key words type positioning; new loose-leaf teaching materials; workbook-style teaching materials; practice status; practice framework

Author Tang Zhengling, assistant researcher of Zhejiang Business Technology Institute (Ningbo 315012); Cheng Yue, associate professor of Zhejiang Business Technology Institute